

谢明良

著

六朝陶瓷 论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六朝陶瓷论集

谢明良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由 © 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朝陶瓷论集 / 谢明良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

ISBN 978-7-108-05666-5

I. ①六… II. ①谢… III. ①陶瓷—工艺美术史—中国—六朝时代—文集
IV. ①J5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4126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校对 常高峰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8-588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16 印张 34.75

字 数 582 千字 图 684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8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谨以本书献呈恩师

盛田 稔 先生

目 录

序论	1
----------	---

上篇 六朝墓出土陶瓷综述

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组合特征及其有关问题	27
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分布及各期的组合特征	27
器形种类及其与时代的关系	32
各期青瓷与陶器的消长	53
出土陶瓷组合与墓葬形制、规模的关系	60
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	163
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的组合特征	164
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的造型和装饰特征	167
福建与其他地区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异同举例	175
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综合探讨	207
东吴墓出土陶瓷	208
西晋墓出土陶瓷	211
东晋墓出土陶瓷	215
南朝墓出土陶瓷	217
江西和其他地区六朝墓出土陶瓷的比较	222
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探	260
铅釉陶的变迁	260
墓葬出土青瓷概况和北方青瓷的发展	271
六世纪北方窑业的传承与动向	284

中篇 六朝陶瓷的装饰

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	305
谷仓罐所见佛像	308
其他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所见佛像	315

综述六朝青瓷褐斑装饰

——兼谈唐代长沙窑褐斑及北齐铅釉二彩器彩饰来源问题	362
墓葬出土褐斑青瓷的时代、分布及其出土情况	363
六朝褐斑青瓷的装饰特征及其窑属	365
褐斑青瓷的产地	370
隋唐时期褐斑、褐彩青瓷——兼谈长沙窑釉彩装饰起源问题	374
从六朝褐斑青瓷谈北齐二彩铅釉陶的装饰来源	381

鸡头壶的变迁

——兼谈两广地区两座西晋纪年墓的时代问题	415
东吴至西晋时期	415
东晋时期	417
南北朝及隋唐时期	421
广州沙河顶西晋太熙元年墓的时代问题	425
广西梧州市富民坊西晋永嘉六年墓的时代问题	430
鸡头壶的用途和名称	431

下篇 墓葬器物的文化史观察

出土文物所见中国十二支兽的形态变迁

——北朝至五代	453
中国十二支兽起源研究诸说	454
出土文物所见十二支兽——北朝至五代	457
十二支兽的造型地域特征及其演变	464

读《颜氏家训·终制》札记	501
七星板	502
蜡	503
弩牙	504

玉豚	505
锡人	508
粮罍明器	509
碑志	510
旒旒	512
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	516

序 论

历来学者对于“六朝”一词的界定并不一致。一般而言，所谓的六朝常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¹它们不但均以建康（今南京）为国都，其疆域虽时有变动，但总以汉水、淮河以南的地区为主。严格说来，六朝理应除去西晋灭吴后的三十七年（280~316），因其首都既不在建康，国土也不限于江南地区，不过江南地区的发展并未因此而中断，所以我是采用现今中国考古学概念六朝包括西晋的观点²一并论述。时间的上下限是自孙权称王的黄武元年（222）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亡于隋之间的三百六十七年。

本论集分三篇，第一篇是尝试以分区讨论的方式考察江苏、江西、福建等地区六朝墓出土陶瓷及其有关问题。第二篇则是针对六朝陶瓷中之佛像、褐斑等具有鲜明特征的装饰题材，以及于壶罐上装饰鸡头的所谓鸡头壶进行探讨。第三篇分别讨论与东方民族生活息息相关的十二支兽形态在中国的变迁过程，以及著名的古典文献《颜氏家训》一书所记载的若干葬仪用物，并尝试从阶级的角度来观察六朝墓葬出土器物。以下我拟概略叙述构成上述三篇之各章的写作动机和构思，随处比照、检讨先学们的研究业绩，并总结各篇章的大致内容兼及本文的研究成果和缺失。

1 所谓的六朝，一般指三国吴以降定都于现今南京（212~280年建业，282~313年建邺，313~606年建康）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代。其间虽因西晋的统一（280~316）而有所中断，不过上述六代均于江南维持政权，并均以贵族制社会为基础具有相似的国家构造，而成为中国史上的一个时代。另一方面，于文学上的用例，颇多将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以至隋代概称为六朝。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则将六朝限定于晋，南朝之宋、齐、梁、陈四代和隋代六个所谓正统王朝；与此相对的，也有认为六朝指晋南北朝，但其内容则与严可均等大体一致，只不过不以南朝为唯一正统而承认北朝独立的存在。

2 南京博物馆编：《江苏六朝青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2。

壹 分区讨论

回顾研究者有关六朝陶瓷史的论著，尽管对于所谓“越窑”的定义见解不一，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³不过多数的研究者则以浙江省越窑系青瓷的发展来概括整个六朝南方青瓷。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地下材料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浙江省以越窑为主的瓷窑不仅产量大、销路广、成品品质精良，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窑业中心，对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窑场或后世瓷窑生产也有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越窑研究日益精进的同时，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各个省份或地区六朝墓出土的陶瓷，无论在造型、装饰特征，以及于墓葬中的组合情形或作品本身材质、制作工艺等方面，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彼此的演进或发展也不尽相同，显然是来自多处不同窑场所生产。因此光是就浙江省绍兴、上虞一带越窑作品之发展来概括整个复杂多样的六朝陶瓷已难满足现实的需要。为了较全面地理解六朝陶瓷的发展轨迹，分区研究是必要的基础工作。而随着中国考古发掘的急速开展所累积的丰富出土资料，已可提供探讨南方大多数地区六朝陶瓷发展的重要线索。

在我学习中国陶瓷史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固然很多，然而最感无奈和遗

3 历来的研究者对于“越窑”的定义并不一致，最狭义的定义恐怕是米内山庸夫所主张，只限于浙江省余姚上林湖畔唐宋时期烧造的著名的秘色青瓷〔米内山，《越窯の研究》（一），《陶説》10（1954-1），页15-18），较广义的越窑既有指汉六朝至唐宋时期于浙江绍兴一带烧制的青瓷〔小山富士夫，《古越磁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8中国上代篇（河出书房，1955），页221〕，又有泛指“百越”地区所烧造青瓷，即浙江、江苏、福建等东南沿海所生产越窑型之灰釉炆器的总称〔佐藤雅彦，《陶磁・土偶》，《六朝の美術》（平凡社，1976），页170〕。由于文献所见越窑之记载不早于唐，而记载上的越窑又均指唐以后狭义越地所烧造之青瓷，为便于区别，长谷部乐尔遂主张或可将唐末五代以后称之为越窑或越州窑，在此之前作品则可冠以古越瓷之名，而后者系泛指广义越地，即包括了南部唐代以前的青釉作品〔长谷部，《三国两晋的古越磁について》，《東京国立博物館美術誌》267号（1973），页221〕。不难看出，越窑定义的分歧除与研究本身判断有关，多少也与其所处时代的考古发掘资料之多寡有所关联。就目前的考古资料而言，作为越窑主要生产地的浙江绍兴、上虞等地自东汉设窑烧瓷以来并无明显中断，因此我较同意近年来朱伯谦所主张，所谓的越窑应是包括绍兴、上虞等地早期窑窑迄唐宋时代窑窑体系的总称〔朱，《越窯》，《中国陶瓷全集》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1981），页168〕。其窑址主要分布于省内曹娥江地区，当然并不包括浙江省之外所谓“百越”地区生产的青釉作品。另外，关于所谓越窑系的现状及其问题点，可参见：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4年会议论文集，《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1号，页58-64；龟井明德，《越州窯と龍泉窯——転換期の青瓷窯》，東洋陶磁学会三十周年記念，《東洋陶磁史——その研究の現状》（东京：东洋陶磁学会，2002），页58-63。

憾的莫过于如何将陶瓷史所呈现的现象有效地结合到历史学的领域之中,即将历史上活生生的匠人们所生产的陶瓷置于文化史中进行观察这一课题。分区研究的另一个引人入胜之处,或许还在于其在一定范围之内,可提供我们今后进一步地理解六朝时期各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现象的有益线索,可与传世史料互相证明,或弥补史料之不足。不过,所谓的地区发展特征毕竟是从比较中得来的,唯有将数量庞大的六朝墓葬出土陶瓷做一综合整理,才有可能从比较中观察各地区出土陶瓷的特征及其在整个六朝陶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各地区基础资料的建立,还有利于我们以宏观的视野来掌握六朝陶瓷的可能发展变迁,进而为不少流传于世的作品提供判别产地或编年的依据。

一、福建六朝陶瓷

在前述构思以及考虑到当时还不见有关福建六朝陶瓷的专门性论著的情形之下,⁴我草成了《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初步探讨》一文。该文首先论述了福建西晋至南朝墓出土陶瓷的组合、造型和装饰特征,并且将之与其他地区六朝墓出土陶瓷进行比较。初步得出结论:就目前有限的资料来看,可将福建六朝陶瓷区分为两晋和南朝两大阶段。两个阶段均以青瓷为主,然前一阶段所见器形种类或造型特征多与江苏、浙江和江西地区颇为相近,不见或少见具有地域特色的作品;后一阶段陶瓷种类趋于丰富,个别墓葬出土陶瓷数量大增,墓葬出土陶瓷组合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等形成较大差距,但却与江西省有许多共通之处,推测有部分陶瓷是来自江西地区窑场。其次,南朝时不仅出现了单管插、四管插等不见于其他地区的特殊器形,同时存在江、浙若干地区于南朝时业已消失的器种,尤可注意的是部分福建南朝墓出土陶瓷造型往往与江、浙地区晋墓所出作品极为接近,反映出相同器类或具有类似造型作品可因地域的不同而出现时代上的差距。就这点而言,过去有研究者在进行六朝非纪年墓葬编年时,经常以墓葬出土陶瓷的造型或装饰特征径与其他地区出土同类作品做跨省比较的做法,姑且不论其结论之正确与否,于方法论上未免失之草率;⁵至于有研究者认为福建六朝青瓷与江

4 拙文发表之后有关福建六朝陶瓷的论述,可参见林忠干等:《福建六朝隋唐墓葬的分期问题》,《考古》1990年2期,页157-164。以及林存琪:《福建六朝青瓷略谈》,《福建文博》1993年1、2期,页70-80。

5 将出土陶瓷做跨省比对以进行墓葬编年的情形,最常见于中国各地发掘报告书,例子甚多,本文无暇列举。

苏、浙江、贵州、广东等省具有共通时代风格的见解，⁶无疑更有待商榷。此外，若将已发现的福建六朝墓及其出土陶瓷的变迁结合文献记载，则又不难看出随着“永嘉之乱”移民入闽，福建地区至南朝时已有较大的开发，其与过去中村圭尔从史学的角度结合考古发掘资料论述六朝福建陈氏所做的若干论断不谋而合。⁷从南朝墓葬数量既多，出土陶瓷大增，晋江地区南朝晚期瓷窑的发现等情形来看，似乎又说明了随着移民开发所带动的生产和经济能力的提高，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较强的陶瓷消费。上述从出土陶瓷所见的现象，或可提供过去历史学者认为福建的开发要晚至唐代⁸的一些资料性参考。

二、江西六朝陶瓷

由于在考察福建六朝墓出土陶瓷时，曾经与长江中下游诸省同期墓葬出土陶瓷的比较，发现福建东晋墓出土陶瓷组合与浙江和江西较为接近，但至南朝时，则无论在器物造型或出土组合等方面均与江西有着惊人的类似，从而与其他省份或地区形成较大的差距。为了进一步地理解上述由考古资料所显示的现象，特别是南朝时期福建与江西之间的紧密关联，并试图对江西六朝陶瓷进行考察，我即着手《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综合探讨》一文。该文仍是经由略嫌枯燥繁琐的考古资料，分期探讨墓葬出土陶瓷的种类、组合和造型、装饰特征。

通过各省墓葬出土陶瓷的再次比较，进一步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吴至西晋墓各省陶瓷基本组合相差不大，不同的只是经济富饶的地区种类丰富，相对落后地区种类贫乏，至东晋时，江西、浙江、福建墓葬陶瓷组合趋于接近，南朝时则以江西、福建最为类似。这除与东晋时江西、浙江、福建大部分地区属扬州，南朝时江西、福建两省属江州的行政区域划分大致相符，也与文献所载上述三地风俗相类一事不谋而合。⁹经由比对，还可推测得知江西、福建部分墓

6 曾凡：《福建陶磁の歴史》，《福建陶磁》，《中国陶瓷全集》27（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1983），页127。

7 中村圭尔：《六朝時代福建の陳氏について》，谷川道雄編《中国辺境社会の歴史的研究》〔昭和六十三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総合研究（A）研究成果報告書，1989〕，页38-47。

8 如日比野丈夫：《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の開発》，《東洋史研究》4-3（1939），页1-27；北山康夫，《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福建の開発に関する一考察》，《史林》24-3（1939），页91-100。

9 《隋书》卷31《地理志》：“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鄞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类豫章。”

葬出土陶瓷之所以如此类似，可能还与福建出土作品有一部分系来自江西瓷窑所生产一事有关。

此外，出土陶瓷的变迁亦如实反映了六朝南方地区从较统一的文化逐渐形成多区域特色的轨迹。如江西省自东晋以后逐渐与江苏、安徽、湖北形成较大差距，至南朝时既与福建密切相关，同时又与湖南和广东有若干共通之处。而江西、福建于南朝时期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地区陶瓷作品中之五盅盘等器形，不仅是两地隋唐时期陶瓷的直接源头，其时代亦明显早于北方。其次，与佛教文物中的所谓水瓶、净瓶或宝瓶造型相近的长颈圆腹瓶式，也最早见于江西数座南朝刘宋墓，其时代亦明显早于北方，这一方面可反驳过去研究者推测该式瓶是由北方影响到南方的观点，¹⁰ 从该式瓶的造型与六世纪中叶日本须惠器同式瓶有相近之处，结合须惠器中的所谓多管饰壶与南方六朝时期常见的五联罐之间的类似性，以及近年来研究者分别从铜镜、服饰等方面考察所显示的南方六朝文物给予日本列岛的影响，¹¹ 进而考虑到五世纪时倭国始终不与北朝接触等文献史实，¹² 我认为过去研究者所主张日本须惠器中的长颈瓶系受到北朝文物影响的说法，¹³ 有待商榷，而有较大可能与南朝同式瓶有关。

就江西六朝墓的出土分布、墓葬陶瓷或窑址调查发掘资料来看，江西地区于南朝时似亦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而从同省出土推测属慧远高僧所创建东林寺之“东林寺乞米”铭文陶罐，¹⁴ 以及不少南朝陶瓷均装饰有象征佛、清净、光辉之莲花瓣纹饰推测，江西于东晋特别是南朝时期佛教似乎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流行。

三、江苏六朝陶瓷

在考察福建、江西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同时，为了参考比较之用，我除了着手整理浙江、湖南、湖北、安徽及两广地区六朝墓出土陶瓷资料，并陆续增补、订正数年前草成的有关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未刊初稿。而随着周边各省资料逐

10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東京国立博物館紀要》16（1981），頁98-99；及同氏：《古墳時代後期の器皿にみる中国六朝器皿の影響》，《東京国立博物館美術誌》412（1985），頁5。

11 如杨泓：《吴、东晋、南朝的文化及其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6期，頁564-573；王仲殊：《从日本出土的铜镜看三世纪倭与中国江南的交往》，《华夏考古》1988年2期，頁76-79转頁68等文。

12 王仲殊：《东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与海东诸国的关系》，《考古》1989年11期，頁1032等。

13 本村豪章：《後期古墳の—様相——細頸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国立博物館美術誌》336（1979），頁8。

14 彭适凡：《江西省の歴史と文化》，《中国江西省文物展》（岐阜美术馆，1988），頁111。

渐整理齐备，江苏六朝墓陶瓷的基本组合特征也渐趋明朗。截至目前，各地经正式发表的六朝墓以江苏数量最多，其中还包括部分伴随出土墓志、地券或纪年砖等可判别墓主身份或绝对年代的墓葬。这些资料不仅可提供探讨江苏六朝墓分期的重要依据，无疑也是分区比较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江苏境内南京为六朝国都所在，镇江既是政经、战略要地，也是北方流民群居之处，太湖地区曾是高级士族周氏家族居地，亦为富饶的鱼米之乡，于六朝史上所扮演的角色自不待言，而数量庞大的出土陶瓷不仅是掌握六朝陶瓷发展面貌的重要指标之一，境内所出越窑青瓷更是理解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越窑生产和行销状况的有力线索。

《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组合特征及其有关问题》一文是依据一九八九年为止发表的江苏境内出土有陶瓷的三百三十座六朝墓葬资料，首先考察了各个时代陶瓷器类于墓葬中的出土频率，并论述了器形种类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东吴墓陶瓷除日常生活器皿外，明器模型或俑类亦占了显著的比例，西晋时一方面出现若干新的器形，但陶明器则明显衰退，东晋墓陶凭几大量出现，人俑增多，其余明器种类除南京地区若干大型墓外，一般更趋少，至南朝时陶瓷种类相对减少，不过陶人俑大量增多，并出现莲花尊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初步地归纳出各个时代墓葬出土陶瓷的基本组合特征，以及个别陶瓷种类的消长和普及状况。其次，有关六朝青瓷的流行时代历来的研究者见解不一，¹⁵ 关于这点，我则在前述考察的个别器形于各期中的出土频率和各期器类与时代之关系等基础之上，观察由于时代的变迁所出现的个别器类材质的变化，进而结合各期墓葬出土青瓷与陶器数量进行比较。虽然江浙地区六朝窑址发掘资料较为有限，从而无法

15 有关六朝青瓷的流行时代，历来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李蔚然认为南京地区东吴时期以陶器为主，青瓷所占比例不大〔李，《试述南京地区六朝墓葬青瓷来源及其有关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 135-139〕，罗宗真则主张江苏东吴时期青瓷已逐渐代替铜器、漆器和陶器，若干墓葬青瓷又以明器为主，从而反驳当时随葬明器多使用陶器的看法〔罗，《江苏东吴青瓷工艺的成就》，《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页 124-128〕。此外，刘建国从镇江地区墓葬资料得出东晋青瓷于遗物中数量最多的结论〔镇江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1983），页 33〕；李蔚然于前引文则又以南京地区为例，主张东晋墓出土青瓷渐少，陶明器增多。蒋赞初亦总结长江下游六朝墓，认为孙吴时期陶明器模型众多，至西晋时已全部改用青瓷制作，东晋时期陶明器模型衰退，但陶生活明器增多，至齐、梁、陈时陶生活明器又超过了青瓷的数量〔蒋，《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1980》（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页 196-205〕。

结合窑址调查所得做进一步的阐述，并且有部分墓葬曾经被盗掘或扰乱，文中难免会掺杂若干偶然的因素，不过却也大体表明：江苏六朝青瓷以西晋最为流行，东晋次之，东吴时期陶器相对流行。而造成吴墓陶器较多的原因，是由于当时流行以大量的陶明器模型或动物俑类陪殉入圻；西晋墓虽有部分明器模型以青瓷为之，然而形成青瓷远多于陶器这一现象，仍在于青瓷器皿类数量的大幅增多。东晋时期就如李蔚然所指出南京地区若干贵族墓仍流行以陶明器殉葬，¹⁶ 不过其余多数东晋墓则均以青瓷数量最多。如果考虑到若干于西晋墓以青瓷为之的作品，至东晋时已由陶器所替代，或东晋墓基本不见西晋时经常可见的青瓷数量远多于陶器的情形，不难看出东晋青瓷已不如西晋流行。另一方面，东晋时黑釉瓷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趣味上的转变值得今后加以留意。东晋时期黑釉瓷以鸡头壶和唾壶最为常见，这固然与该一时期较流行该类作品一事有关，不过倘若结合六朝墓所出若干器形仅见青瓷或只见陶器等情形来看，似乎可以推测六朝陶瓷制作已经出现因应不同用途或若干特定器形而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原料来生产加工。

此外，为了理解分属不同阶级墓主墓葬中陶瓷的使用情况，从而间接窥测各类陶瓷的可能消费情形，我则根据构筑规模将墓葬大略区分为大、中、小三型，进而结合可确认或可大致推测墓主身份的墓葬资料进行考察。¹⁷ 结果表明：各时期墓葬出土陶瓷的多寡、青瓷与陶器的比例以及伴随出土的其他材质文物，绝大多数与墓葬规模大小成正比。结合部分可判明墓主身份墓葬资料，则西晋大型墓主包括江南豪族义兴周氏主要成员和若干官僚阶级；东晋大型墓主包括帝王皇族、北方高级士族和江南豪族义兴周氏成员；中型墓主有南朝北人次等士族及家族；南朝大型墓多为皇族；中型墓包括了中下级官僚。至于小型墓虽缺乏可判明墓主身份的直接证据，不过从墓葬规模和伴随出土文物推测，有可能是包括若干下级官僚在内的庶民阶级墓葬。同一时期各型墓葬之间出土陶瓷种类虽然未必泾渭分明，不过仍可大略窥知各型墓葬较为常见的陶瓷种类，特别是东晋时期南京地区大型墓所出陶器，多以所谓的龙虎形座、长方盒、人俑、盘、凭几、耳杯、

16 李蔚然，同注 15，页 135-139。

17 过去的研究者亦曾针对南京及其邻近地区六朝墓的形制、规模和墓主关系进行讨论，其中又以中村圭尔将墓葬形制、规模结合已知墓主之籍贯、等级、南北人问题所做的细密考察最具参考价值，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参见中村：《南京付近出土六朝墓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人文研究》34-12（1982），页 39-88。后来，同氏又在上文的基础上针对六朝墓出土陶瓷的组合等议题进行了颇得要领的概括。详见中村：《江南六朝墓出土陶瓷の一考察》，《中国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3），页 83-135。

榻等构成其基本组合特征。另从近年湖北老河口西晋墓出土的梯形陶座坡面阴刻“泰始九年作烛□衣□好也”等字铭，可以推测所谓陶座当中有的应属烛座。¹⁸ 无论如何，从出土有龙虎形座墓葬一律属王陵级大墓且不见于南方其他地区，推测应是当时皇族成员特有的随葬器物。

总结六朝墓出土陶瓷，不难发现尽管各省的开发程度、经济发展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陶瓷消费状况，彼此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不过东晋墓基本少见或不见流行于吴至西晋时期的明器模型这一情形却大体一致，而江苏常见于吴至西晋时期的多室墓至东晋时亦为单室墓所取代。¹⁹ 种种迹象显示六朝葬俗于东晋时有了较大的变化。过去曾有学者撰文考察魏晋葬制，认为孙吴和西晋南方地区流行厚葬，东晋偏安江南因受中原薄葬风气影响而产生了变化。²⁰ 江苏六朝墓出土陶瓷的变迁，亦如实地反映了吴、西晋流行厚葬，至东晋以后有所俭约这一葬俗趋势，可以印证传世史料记载基本无误。

四、魏晋十六国北朝陶瓷

另一方面，相对于南方六朝青瓷窑系作品，北方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则似乎还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²¹ 由于正确地掌握北方这一时期出土陶瓷的具体面貌，不仅有助于今后以更健全的视野来观察南方六朝陶瓷，亦与如何正确评估隋唐陶瓷的工艺成就息息相关。因此，《魏晋十六国北朝墓出土陶瓷试探》一文即是从魏晋十六国墓出土铅釉陶资料着手，首先反驳以往部分研究者所主张铅釉陶

18 老河口市博物馆（徐昌寅等）：《湖北老河口市李楼西晋纪年墓》，《考古》1998年2期，页34图4。

19 中村圭尔亦曾指出最晚的多室墓属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墓，以后不见出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到底是考古发掘的偶然因素？或是多室墓于某一历史时期趋于消灭？若属后者其具体原因不明（中村，同注17，页42-43）。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亦可见到由多室墓向单室墓变化的过程，至西晋中晚期单室墓已成为中原墓葬的主要形制，而西北及东北地区亦于十六国时期完成了这一变化（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1期，页41参照）。俞伟超亦曾指出约从三国西晋时期开始，许多身份极高的贵族墓往往变成单室墓，墓形制度从此进入一新阶段，“汉制”已被逐出历史舞台而出现“晋制”〔俞，《汉代诸王与列侯墓葬的形制分析——兼论“周制”、“汉制”与“晋制”的三阶段性》，《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337〕。魏鸣以为这种“晋制”当肇始于西晋，最终成熟于东晋〔魏，《魏晋薄葬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4期，页139〕。

20 魏鸣，同上注，页133-143。

21 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同注10，页31-144。该文是笔者所知目前唯一够分量的有关北朝陶瓷的专论。

于魏晋时已经绝迹的说法,²²进而谈及北朝铅釉陶的动向。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是,主要作为陪葬明器流行于东汉的铅釉陶,至西晋时已经产生重大的变化,东汉墓常见的耳杯、盘或仓、灶以及各式人俑、动物俑于西晋时期除了北京少数几座墓葬之外,已基本消失。西晋墓最常见的铅釉陶器是一墓多只出土一件,制作精巧,满釉以支钉覆烧的所谓绹釉小罐。这类烧制于北方的小罐较常见于洛阳地区,但亦曾被携进南方六朝墓中,后者墓主等级较高,除了本文已曾征引的江苏宜兴平西将军周处墓、南京象山七号王虞墓等之外,近年公布的南京仙鹤观东晋高崧家族墓(M6)、²³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等均有出土。²⁴就目前的资料看来,曹魏至北朝之间铅釉陶虽处于低迷的状况,但有复数地点持续烧造,器形除了所谓绹釉罐之外,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墓(M28)曾出土绹釉羊尊,²⁵近年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更出土了腹饰马镫的褐釉铠马。²⁶北方铅釉陶于北魏中期偏后的五世纪后半再度复苏,并于北齐时达到高峰。由于铅釉陶和其时北方青瓷的造型装饰类似,若未观摩实物往往不易区别,如本文写作时就错误地将山西北齐武平六年(575)娄睿墓和河北磁县湾漳推测是北齐文宣帝高洋帝陵出土的黄绿釉作品视为北方青瓷。就目前的资料看来,娄睿墓的黄绿釉灯台和高洋陵出土的黄釉带颈罐均属低温铅釉。²⁷北方青瓷的起源与发展也是引人入胜的议题之一。虽然北魏墓出土青瓷是否全由

22 如三上次男:《陶器講座》卷5,中国I(东京:雄山阁,1982),页275。李知宴也主张北方魏、西晋墓中没有发现陶[李,《中国陶艺术》(香港:轻工业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页100],并认为北燕太平七年(415)冯素弗墓的陶罐是三国以后北方发现最早的釉陶器(页101)。此外,巽善信氏则认为北魏司马金龙墓的作品是汉代以来再度出现的时代最早之铅釉陶[参见:巽,《三彩に關すち一考察》,《天理参考館報》6(1992),页86]。

23 南京市博物馆(王志高等):《江苏、南京仙鹤观东晋墓》,《文物》2001年3期,页10图14。

24 南京市博物馆(华国荣等):《南京北郊东晋温峤墓》,《文物》2002年7期,页28图21。

25 《喇嘛洞鲜卑墓地》,《中国文物报》总753期(1999年11月3日)第三版;张克举等,《剽悍独特的骑马民族文化——辽宁北票喇嘛洞鲜卑墓地出土文物略述》,《文物天地》2000年2期,页11-14,和封二右下图。不过,张氏等人将出土的绹釉小罐和羊尊视为南方作品。本文对此判断不予采信。另外,清楚图片可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燕文物精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图版111。

26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卫鹏等):《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2004年8期,页13图13。

27 有关娄睿墓出土黄绿釉作品的属性,我当时忽视了冯先铭《从娄睿墓出土文物谈北齐陶瓷特征》(《文物》1983年10期)一文所已指出的应属铅釉陶的看法(页30),而保守地沿袭了发掘报告书所称“瓷器”的见解(《文物》1983年10期,页10)。从近年刊载的清晰彩图可以确认娄墓的鸡头壶、贴花瓶、灯台等均属铅釉陶,图可参见: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齐娄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图59-66。但是,该书仍然是将娄墓出土上述作品称为“瓷器”。同样地,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彩版33亦可确认这座推测系高洋帝陵墓所出带颈罐也应属铅釉陶,但是报告书仍旧将之归入“青瓷”(页138),应予修正。

南方所输入，还有待日后进一步的资料来解决。而部分北朝墓如安阳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的白釉制品，是否确属报告书所宣称的白瓷，抑或只是铅白釉陶，仍然有待查证。²⁸ 无论如何，六世纪北方铅釉陶造型往往仿自南朝青瓷，但同时期的无釉秦陶却多具北方传统器形是一个值得注目的有趣现象。施釉陶瓷数量虽少，然而却是时代的主流。总之，北方窑业于东魏、北齐时有了较大的发展，隋唐陶瓷主要承袭了该一烧瓷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而南朝陶瓷则是六世纪北方陶瓷的重要范例之一。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隋唐制度不外乎出于北魏、北齐、梁、陈，以及西魏、北周等三源，²⁹ 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隋唐陶瓷的因袭确有与半世纪前陈氏所做论断相符者，而以北魏、东魏、北齐的影响最为直接，并反映在葬仪制度和殉葬的组合等各方面。在惊讶史家洞察先机的史观之余，不禁让人再次深刻地体会到陶瓷史与历史承传之间的紧密联系。

贰 装饰题材的讨论

一、佛像装饰

《三国两晋时期越窑青瓷所见的佛像装饰》一文，是我有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汉六朝佛教图像或佛教南传系统的讨论正方兴未艾，然而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饰有佛像之东吴、西晋陶瓷器这一珍贵资料，却因未能细加整理，以至于不仅难以清晰而全面地提供给相关学科研究参考之用，对于陶瓷史研究本身而言，也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因此我尽可能地搜罗已发表的该类作品，试图从陶瓷史的观点探讨以越窑青瓷为主的陶瓷器上所见佛像装饰的出现年代、分布、延续及其表现特征和可能的意涵。

装饰有佛像的六朝陶瓷，以所谓的谷仓罐数量最多。谷仓罐分布于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福建等地，而以江、浙地区出土最多。就纪年作品的时代而言，虽早自吴永安三年（260）已可见到，不过饰佛谷仓罐的时代则多集中于三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目前最早的纪年例见于台湾私人藏宝鼎四年（269）作品，最晚的例子则见于江苏两座西晋元康七年（297）纪年墓中。尽管从部分

28 龟井明德：《北朝、隋代における白釉、白瓷碗の追跡》，《亞州古陶瓷研究》（2004），页39-52。

29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台北：里仁书局，1981），页1-2。